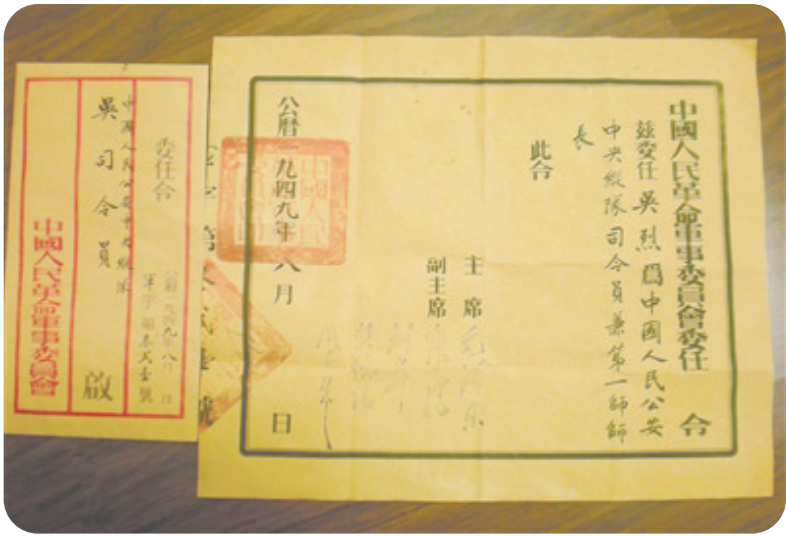


红色警卫将军吴烈

□ 周治龙



1949年，吴烈任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兼第1师师长的任命书

在我军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指挥员，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调到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队队长到中央警卫团团长，从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从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到原北京军区副政委、顾问，被人们称为“红色警卫将军”。他就是开国少将吴烈。

吴烈，1915年10月出生，江西萍乡人。9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安源煤矿当了一名童工。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护厂斗争等革命活动。

1930年5月，吴烈在安源新街茶亭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6军第1纵队第1支队第1连战士。因为战斗勇敢，他很快当上班长。在攻打文家市的战斗中，他右腿被敌手榴弹炸伤，用绷带简单包扎后继续追歼国民党军残兵。此战后，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红7师第19团第1连排长。不久，他调到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队工作，担负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安全警卫任务。

特务队组建后，总前委首长非常关心这支队伍。一次，毛泽东、朱德到队里看望大家。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粗布军装，脚穿旧布鞋。朱德穿着破旧灰军衣，打着绑腿，脚穿草鞋。战士们看到威震敌胆的红军领袖竟如此简朴，感到非常亲切。毛泽东问吴烈叫什么名字，参加革命前干什么，吴烈逐一回答。当吴烈讲到参加红军前在安源煤矿当学徒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萍乡、安源我去过多次，那里工人阶级觉悟很高，罢工运动对全国影响很大。”最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参加了革命，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0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在江西新余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吴烈带领特务队负责会议警戒，保护首长安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向吴烈询问特务队官兵的思想情况，并要求大家随时做好外线作战准备。

12月，特务队扩编为特务大队，辖3个队，吴烈由排长升任特务队队长。不久，他接任大队长。

12月29日，国民党军“围剿”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

部向龙冈推进。毛泽东、朱德决定在龙冈和君埠间的黄竹岭歼灭该敌。30日上午，张辉瓒部遭到红军迎头痛击后展开反扑，部分国民党军向总司令部指挥所涌来。吴烈带领特务大队主力迅速实施阻击，并派部分官兵保护总前委首长立即转移。当涌上来的国民党军爬到半山腰时，吴烈指挥警卫战士一齐开火，消灭了这股残敌，总前委首长脱离了危险。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4日，红军总司令部截获国民党军第28师公秉藩部明码电报，得知该师15日从富田向东固进击。毛泽东、朱德商定在九寸岭和观音庵间设伏歼敌，指挥所设在白云山上。16日拂晓，吴烈率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首长向白云山指挥所疾进。当路过一座小桥时，他们与公秉藩部先头部队遭遇。为了赢得时间，吴烈护卫毛泽东等首长且战且退，迅速向指挥所转移。他命令战士扔掉背包，枪上刺刀，准备展开肉搏战。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秘密赶来的红3军主力从密林中猛冲下来，使敌军陷入一片混乱。吴烈这才松了口气。此战，红3军主力歼灭敌第28师大部。战后，特务大队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吴烈任大队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吴烈带领国家政治保卫团第1营，重点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干部休养连的安全。红军过草地前，粮食极为匮乏。有一次，吴烈发现牦牛粪里有一些未消化的青稞和黑

豆，洗净炒熟后还可以食用，就介绍给干部休养连的人。后来，有人竟收集到两三斤这样的救命粮，并靠这些粮食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二

1938年2月，吴烈调任新组建的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工作，主要负责中共中央首长和驻地的警卫工作。

1942年10月，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和军委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于中央军委。10月20日，中央警卫团在延安侯家沟召开成立大会。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宣读命令，任命吴烈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兼任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中央警卫团对外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主要执行保卫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及要害部队安全和卫戍延安的任务。会上，叶剑英风趣地说：“中央警卫团应改叫‘钢盔团’。钢盔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脑袋的。警卫团就要像钢盔一样，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

为使中央警卫团成为一支能文能武的警卫部队，吴烈对全团官兵进行了严格的履行职责教育，并建立了正副班长带班、干部查哨等制度，还开展了文化扫盲活动。同时，他带领全团官兵投入大生产运动，自办造纸厂和合作社。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吴烈既肩负着会议警卫任务，又作为中央直属机关选举的候补代表参加了大会。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大会警卫处负责人，吴烈采取对外严密控

制、对内加强警卫、要害部位布置双警戒等措施，构成严密的警卫网。作为大会代表，吴烈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报告和讲话，对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对革命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三

1949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四野战军第47军第160师改为第207师，隶属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与中央警卫团一起担负中央领导、机关和平平的卫戍任务，吴烈任第207师师长。

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汽车离开河北平山西柏坡前往北平，24日深夜在涿县换乘火车，25日凌晨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后，吴烈奉命接护他们到颐和园益寿堂作短暂休息。下午5时，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随后，吴烈率警卫营护送毛泽东安全住进香山双清别墅，直到开国大典前夕才移居中南海。

8月3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吴烈任司令员。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后，先后担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国大典、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等重大国事活动的警卫任务。

四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警卫、司礼任务逐渐增多。1959年1月22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撤销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北京市的警卫部队。吴烈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吴烈受命组建北京卫戍区后，经过一周的紧张筹备，北京卫戍区于1月30日正式成立。1955年，吴烈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摘自2022年8月21日《解放军报》）



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需要确立三大支柱

主体力量、协作机制、重点领域是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抓手。

从主体力量看，发达国家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成果的最大受益者，理应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内部多种矛盾加剧、民粹主义上升、政局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下降等原因，制约了它们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但它们也应履行义务，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避免政策负面效应外溢，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代表了国际秩序演变的潮流所向。这些国家追求更高水平发展和改善全球发展环境的愿望更加强烈，是推动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可以依托的重要力量。它们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更好解决面临的各种发展难题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团结自强，深化合作，推动发展领域的全球治理取得进展。南北双方应相向而行，推动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两大倡议落地见效，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从协作机制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鼓励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工商界、社会



甘祖昌从井冈山起步，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用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传奇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

1952年春，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检查工作返程时，车翻到河里，身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他每日为生病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他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写报告，请求组织批准他回江西农村去。1957年，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到江西省莲花县。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耕地大多是冬水田，亩产只有100多公斤。他用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给农田开沟排水，粮食亩产提高了50%。由于他带领群众在改造冬水田等方面成绩卓越，中科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研究员。

1962年2月，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说：“我们公社的田就得了两种病：一是肺结核，二是胃肠炎。犯胃肠炎的冬水田我们大队整治得初见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库的办法医治肺结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这两种病治好，群众就会拥护你。”经过长期奋战，浆山水库建成了，灌溉水渠也同时完工，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又和技术员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设施。只用了1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建筑工程师冒严寒、顶酷暑，3年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



甘祖昌：将军回乡当农民

□ 邢浩

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1985年，甘祖昌旧病复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说：“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势转重，不时陷入昏迷状态。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我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摘自2018年6月5日《人民日报》）

（上接1版）

我国国情复杂，发展和安全面临的问题多样、场景多变。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进入新时代，这两大奇迹不断得到延展和巩固，标志着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为这一重要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借鉴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各国共同努力统筹解决全球领域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国家治理层面拓展到全球治理层面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加速演变的宏阔背景下，我国的发展和安全的同世界的发展和安全的愈加深度联动。从世界发展看，世纪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全球多年发展成果遭受吞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南北鸿沟继续拉大，粮食、能源安全出现危机，一些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人为干扰，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有的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搞“小院高墙”和极限制裁，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断走弱。从国际安全看，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翳不散，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家安全概念泛化特点突出，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特别是，一些国家力图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

全，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漠视别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如果任由这种危险势头发展下去，世界会更加动荡不安。在全球化时代，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波及世界各国，需要各国协同采取行动。

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强烈愿望，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国家治理层面运用到全球治理层面，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强调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关于全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呼吁认清大势，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主张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时代，造福各国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促进创新要素全球流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携手实现跨越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

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抗疫药物，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关于全球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主张国际社会要摒弃零和博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强调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客观地看，当今世界很多安全问题都源于发展问题，很多发展问题要得到更好的解决需要有更加有利的安全条件作为保障，很多安全问题要得到可持续的治理也需要通过发展来提供良好的土壤。也就是说，只有各国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共同统筹把握好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才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